

建设性新闻的冷思考：中西语境、理论风险与实践误区

徐敬宏 张如坤 张世文

(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2019年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建设性新闻的研究热潮,一些学者对其褒扬有加,但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本文从批判的视角出发,辨析中西语境下建设性新闻的不同内涵,指出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向善的新闻理念,其积极心理学技巧的运用和面向未来的方案导向与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具体的应用中要警惕潜在的理论风险,避免过分强调“积极心理”和“方案导向”而走极端,应结合我国的国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新闻的建设性;积极心理学;新闻理念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使用负面、冲突的叙事框架报道新闻,西方新闻业面临如何与公众保持联系、重新定义公共服务、抵御激烈竞争、缓和新闻消极性、唤起公众希望的问题(Hermans & Drok, 2018)。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与回应,西方新闻业界提出了建设性新闻的概念。2008年丹麦广播公司前新闻部执行主任乌尔里克·哈格普鲁(Ulrik Haagerup)在一篇新闻评论中首次使用“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一词(Bro, 2019)。2017年我国学者晏青正式将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形式予以介绍(晏青、凯伦·麦金泰尔, 2017),随后,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研究逐渐增多。2019年11月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社科论坛以及12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建设性新闻”增刊,更是将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推到了一个高峰。我们认为,在建设性新闻研究比较火热的当下,认清“建设性新闻”的中西语境,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风险和实践误区,具有理论的必要性和实践的紧迫性。

【作者简介】徐敬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如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世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建设性新闻”的中西语境

建设性新闻是一种涵盖多个要素的“伞式”理论，它边际模糊、辐射宽泛（金苗，2019），对于其概念和缘起的理解需要重返原初的生成语境。一方面，要厘清建设性新闻与含义相近的概念之间的异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中西语境的差异，与中国语境下新闻的建设性相区分。

（一）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

“建设性新闻”与“积极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好新闻”（good news）、“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方案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修复性叙事”（restorative narrative）、“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等新闻类型有共通之处，例如它吸收了积极新闻、好新闻中的正面叙事（唐绪军、殷乐，2015），方案新闻中的针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杨建宇，2015），公共新闻中的为公共利益服务（蔡雯、郭浩田，2019），和平新闻中的反对冲突报道（郭毅，2020），公民新闻中的广泛参与等。从这个层面来看，建设性新闻容易与其它新闻类型相混淆，对于建设性新闻的解读要注意语义上的模糊性，把握其概念的本质，才能将建设性新闻与其他新闻区别开来。

学者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和凯瑟琳·基伦斯斯泰德（Cathrine Gyldensted）指出，建设性新闻就是运用积极心理学的PERMA模式：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参与融入（engagement）、和谐关系（relationship）、共同意义（meanings）、任务达成（accomplishment）来重构新闻生产流程（McIntyre & Gyldensted, 2017）。在新闻实践过程中，使用了积极心理学技巧的新闻形式都可以视为建设性新闻的种类，例如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恢复性叙事（晏青、凯伦·麦金泰尔，2017）。总之，建设性新闻就是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将积极心理学技巧运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生产富有建设性的新闻报道，这种建设性表现在侧重解决方案、面向未来、反对观点极化、与公众寻求合作等方面（McIntyre & Gyldensted, 2018）。建设性新闻的各种要素（关注上下文、面向未来、侧重解决方案、面向公众）不可能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全部体现出来，但在实践中可以积极采纳建设性新闻的元素（尼科·德罗克、莉丝贝特·赫尔曼斯、林晓平，2019）。

综上所述，从属种关系来看，建设性新闻是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恢复性叙事等新闻类型的上位概念，强调在新闻报道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技巧，它是多种新闻要素的集合体。集合体的特性决定了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由此来看，建设性新闻的本质不是一种具体的新闻类型，而是一种向善的新闻理念，它贯穿于新闻的生产、传播、反馈的全过程，其核心是积极心理学的运用和提供解

决方案的未来导向（如图1所示）。将建设性新闻与语义相近的新闻类型相提并论，把建设性新闻界定为一种新闻写作方式、新闻类型、新闻形式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没有把握建设性新闻的本质。也正因为如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正如《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吴湘韩所言，“如果简单称为‘建设性新闻’，容易造成学术界和业界在概念上的误读与偏差，以为是一种新闻类型”（吴湘韩，2019）。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新闻理念，在坚持运用积极心理学技巧、为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其外延在实践中也不断丰富，例如包容与多元、面向未来、协同创新（史安斌、王沛楠，2019），侧重运用建设性采访技巧、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等（蔡雯、凌昱，2020）。



图1 建设性新闻的本质、内涵与外延

（二）我国语境下新闻的“建设性”

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建设性新闻，但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却由来已久。一些民生新闻、服务新闻、问政节目、新闻调查节目和暖新闻等，都具备某些“建设性”特征（张艳秋，2019），但这种新闻的“建设性”与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是有区别的。在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孕育于“民生内容、民众视角、民本取向”的民生新闻，历经帮忙新闻、问政节目和暖新闻等发展历程。首先，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常常与新闻的舆论监督联系在一起（刘九洲、陈曦，2007；王英、陈金华，2009），而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不等同于我国具有建设性舆论监督特征的问政新闻、新闻调查节目，原因在于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的落脚点是公民和社会，我国新闻的建设性突出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郭毅，2020），与党中央的反腐倡廉、维护公平正义的精神一致。其次，不能将所有的正能量新闻、暖新闻笼统地归入建设性新闻，虽然二者都注重积极情绪的烘托，但是我国的暖新闻更多聚焦身边的好人好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典型人物报道，没有上

升到建设性新闻提供问题解决的社会经验层面。再次，以往的民生新闻、服务新闻也不完全等同于建设性新闻，民生服务类新闻旨在帮助群众解决群众生活难题，提供便民服务和生活小妙招，更多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例如旧楼加装新电梯、假日出行指南等，而不是灾难、战争、贫困等宏大话题。

有学者指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新闻”的探索实践是从2016年前后开始的（殷乐，2019）。例如，在凤凰网，其品牌栏目《政能亮》围绕国务和时事热点进行建设性解读，对网友的疑惑进行正面回应，实现和政策发布的良性互动；另一栏目《政对面》则主打“中国互联网首档高端政务访谈节目”，邀请政界、学界、业界的一流专家学者作为对话嘉宾，聚焦宏观层面的现实问题，提供专业的对策，也实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邹明，2019）。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运用“意见开放、共同面对、协商解决”的建设性报道框架，进行了“苏州轨交七块六诉讼”和“上海迪士尼翻包检查事件”等一系列报道。前者解决了苏州轨交卡内余额低于7块6不让进站这一问题，后者则最终让上海迪士尼取消了“游客禁带饮食和违者将搜包检查”的霸王条款。另外，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还选择在黄金时段开设建设性新闻栏目，先后关注了数百个公共话题，对政府工作提出3000多条建议，推动了10多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陆玉方，2019）。此外，《中国青年报》的暖文周刊（吴湘韩，2019）、《新京报》的专题评论（余宗明，2020）等也开始融入建设性新闻的理念。

总之，我们不能脱离了社会制度和新闻体制的语境，将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和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完全等同，生搬硬套地用建设性新闻的概念来阐释我国的新闻实践，认为我国以往的新闻调查节目、民生新闻、暖新闻等就是建设性新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二者割裂和对立。虽然我国新闻的建设性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具有差异，但是建设性新闻理念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的，在我国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以将这种新闻理念融入到新闻调查节目、民生新闻和暖新闻中去，实现二者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新闻对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功用。

二、建设性新闻的理论风险

建设性新闻的中西语境不同，中国媒体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路径依赖与社会建构也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漆亚林，2020），因此，要注意西方建设性新闻的理念移植可能带来的理论风险。

（一）大众传播时代的传者本位色彩过浓

建设性新闻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发于业界，释于学界。一项最新统计表明，传统媒体仍是目前全球进行建设性新闻实践的主力军，占比57%（殷乐，2019）。

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大众传播时代遗留下来的传者本位的色彩。一方面，奉行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媒体，希望通过积极正面的新闻报道，实现传统新闻价值观的纠偏，进而引导舆论，启迪民智。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与公民新闻不同，前者对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针对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它在无形之中也提高了公众直接参与的门槛，在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建设性新闻意在强化传统媒体的“金话筒”地位。从某种角度看，建设性新闻与新媒体传播时代的受者本位理念、互联网的用户思维存在一定冲突，有学者指出，只有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置于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下充实概念内涵，才能拓展向上生长的空间（胡百精，2019）。

此外，在这种传者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较多涉及新闻的生产方，即媒体与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和作用，却没有涉及作为使用方的受众如何接受新闻并受其影响（李喜根，2019）。虽然建设性新闻的愿景是美好的——新闻工作者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采用积极的新闻叙事，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新闻方案，但也容易受到夸大媒体作用和忽视受众自主性的批评，即认为受众是靶子，积极的报道、解决方案的提供势必带来积极的情绪，忽视受众的认知和接受情况。一方面，受众对积极情绪的认知具有不确定性，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网络和信息环境中，受众信息来源多样化、意见多元化，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看来，受众会根据自身需求主动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过滤掉不感兴趣的信息，随着受众对媒介信息消费量的增加，受众也在不断“进化”之中，受众可能会对积极情绪的泛滥产生审美疲劳，消解建设性新闻中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受众对新闻报道中的解决方案的接受程度也是多样的，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受众态度、提升积极情绪，无效的解决方案不但不会起到提高积极情绪的作用，反而会引发消极作用，例如“幸福”的假象、“成功学”式的“成功”、以微不足道的“问题解决”麻痹自我或转移视线等（胡百精，2019）。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的注意力是稀缺的，媒体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影响和支配受众（李喜根，2019），受众在建设性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环节的参与率并不高，传播链条上的反馈环节时而缺失。

（二）认知、行为层面的媒介效果有待证实

国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报道，对受众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仅仅局限在媒介效果的初级层面，即情感态度层面上，深层的媒介效果如认知、行为等还有待证实。凯伦·麦金泰尔通对一组对照实验发现，阅读带有积极情感新闻的人比阅读带有消极情感新闻的人对新闻的态度更佳，并且亲社会行为的意愿更强，而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使读者具有阅读好感，但不会影响读者的行为意图或行为（Mcintyre, 2015）。丹尼斯·巴登（Denise Baden）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灾难

性的、负面的报道框架，提供解决方案、引发积极情绪的框架会对被试的情绪产生更多积极影响，被试采取行动的意愿也更高（Baden et al., 2019）。此外，荷兰一项对于儿童观看电视新闻的实验进一步发现，观看建设性新闻的儿童比非建设性新闻的儿童虽然表现出更少的消极情感（恐惧和悲伤），但是消极情感对于新闻内容（建设性和非建设性）和内容回忆（一般新闻信息和特殊故事情节）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Kleemans et al., 2019）。换言之，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融入负面事件报道中虽然能激发受众的积极情感，但是这种积极情感对于受众的认知效果没有显著作用。其他学者也证实了建设性新闻对情感态度具有显著影响，但对认知和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Kleemans et al., 2017; Meier, 2018）。

目前，我国关于建设性新闻的媒介效果研究比较欠缺。由于中西文化和新闻制度的差异，未来的实证研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是媒介环境。长期以来，西方受众沉浸在以冲突和负面情绪为主报道框架的媒介环境中，实验对象在接受实验刺激后可能产生短暂的“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容易被当作对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反应。而我国受众面临的媒介环境不同：一方面，我国主流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上夹杂着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讯息。此外，我国受众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媒的信息冲击。在这种复杂的媒介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众对建设性新闻的反应可能不同，其媒介效果具有放大或缩小的不确定性。其次是阅读场景。建设性新闻必须先到达目标受众，才可能发挥作用。在上述西方的效果实验中，被试往往在实验者的要求下仅仅阅读指定类型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不仅不存在其他类型新闻的竞争，而且被试主动选择信息的权力也被剥夺。在今后进行相关研究时，要注意尽量还原真实的阅读环境，考虑到自然状态下受众经常处于多场景、移动化、碎片化乃至多屏化的情境中。最后是媒介素养。在阅读建设性新闻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改变受到自身媒介素养的限制。刻板印象、既有的政治观念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受众的阅读偏好和选择性倾向，即选择性感知、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记忆，进而干扰媒介效果，因此在研究设计中要将有关控制变量考虑进来。

综上所述，今后关于建设性新闻的媒介效果研究，应该放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之下，采取更为严密的研究设计，并需要关注建设性新闻带来的长期涵化效果。

（三）存在“积极心理”“方案导向”极化的风险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理念，根植于积极心理学，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未来解决方案（徐敬宏等，2019），这是建设性新闻理念鲜明的优点，但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能会脱离建设性新闻理念的科学指导，走向片面追求“积极心理”和“方案导向”的极端，从而误入歧途，背离初衷，甚至产生负面效果。

为了更直观地诠释建设性新闻理念的两种极化风险，笔者绘制了新闻的情感与时间分布示意图（如图2所示）。X轴代表媒体的情感立场（消极、中立、积极），Y轴代表

报道的时间定位（过去、现在、未来）。X轴以下区域为历史的研究范畴，不做细分，X轴以上区域为新闻的研究领域，以原点所在的垂线将新闻划分为两类，左侧是冲突对立框架下的新闻类型，例如以“扒粪”、揭露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负面新闻、调查新闻，右侧是可以纳入建设性新闻理念范畴的新闻类型。在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范畴中，越接近原点，代表越聚焦当下、价值立场越中立，如西方的公共新闻、公民新闻，我国的问政新闻、民生新闻；越靠向X轴右侧，新闻的情感立场越积极，如西方的积极新闻、好新闻，我国的暖新闻；越靠向Y轴上方，新闻越具有未来视野，例如预期新闻、方案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则介于未来导向和积极叙事的中间位置。在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区域内，X轴与Y轴对角线的延伸方向代表新闻的建设性随着积极情感的运用、面向未来的方案导向的增加而提升，新闻的社会价值也越大。从理论上来看，建设性新闻理念有一定的有效区间限制，当X轴的情感立场和Y轴的时间分布走向无穷，就会越过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边界，出现“积极心理”“方案导向”两种极端化的情况。下文将详细阐述这两种极端化的情况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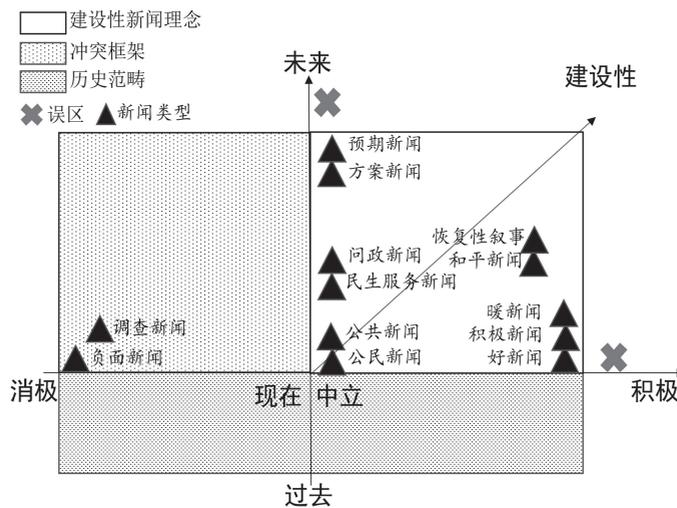


图2 新闻的情感(X)与时间(Y)分布示意图

三、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误区

如上文所述，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理念可以融入到多种新闻类型中，但建设性新闻是有边界的，并非所有的积极新闻、好新闻都是建设性新闻，也并非所有的方案新闻、预期新闻都是建设性新闻。在具体新闻实践中，要谨慎地把握好“积极心理”“方案导向”的天平，避免走极端，遵循新闻生产的客观规律，综合考虑新闻背后的权力、受众等复杂因素，否则就会出现“积极心理”泛滥成灾和“方案导向”过犹不及两种后果。

（一）“积极心理”泛滥成灾

建设性新闻理念是“积极中立”（positive neutrality）的，它将公众的视野引入“公共之善”的同时，又能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Bro, 2019）。但是，在具体的新闻生成过程中，媒体能否很好地控制“倾向罗盘”，成为建设性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有学者指出，建设性新闻倚靠的积极心理学具有一定风险，积极心理学容易倒向“专制的积极态度”（胡百精，2019）。当“积极心理”逾越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边界，走向“积极”的极端时（如图2所示），就会带来以下问题。

一是“积极心理”极端化侵蚀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原则，为权力寻租带来可能。建设性新闻的“建设性”暗含由传播者来引导、建设，“建设性”本质上包含了媒体的倾向性、导向性（蔡雯，2019），究其原因在于新闻场域背后的权力控制和“公共之善”的复杂性。一方面，媒体在服务受众、提供信息的同时，面临市场、政府的双重压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影响媒体的独立性。一项对于21名埃及和突尼斯记者的采访研究发现，政治权力结构、私有制以及“建设性”一词的负面含义是建设性新闻面临的主要挑战（Baden et al., 2019）。积极与中立之间的过渡地带成为商业操盘、政治宣传的可利用空间，为“权力寻租”带来可能，一些媒体甚至打着建设性新闻的幌子将其观点和价值导向植入新闻报道中，使得硬新闻软化，新闻与评论的边界模糊化，新闻变成政党宣传或商业广告的工具。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的“建设性”是相对的，“公共之善”难以顾及所有的利益群体。有学者指出，新闻质的规定性与意义导向之间很难建立起全球性通约标准和调试机制，对本国的“建设性”报道未必不是对他国的“破坏性”报道（漆亚林、刘静静，2019）。

二是“积极心理”泛滥成灾使新闻报道沦为“心灵鸡汤”。新闻的核心功能是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宣传说教，建设性新闻也可以报道负面事件，这一点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建设性新闻也要警惕对负面事件的正向扭曲：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不能用来掩饰社会问题，要与积极的案例保持适当距离（Meier, 2018）；另一方面，在运用积极心理学技巧的时候，要避免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简单化倾向，忽视积极心理的消极作用、消极心理的积极作用，过度夸大主观心理作用，低估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心理”泛滥和信息传播的无序导致湖北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饱受诟病。例如为了宣扬医护人员大公无私的精神，《流产后10天，武汉90后女护士重返一线》《危机时刻，他毅然站出来实施插管手术——“我是党员，我先上”》等新闻报道，对一些真实细节的主动舍弃和删除，而专门凸显医护人员“不顾身体状况”“甚至与病毒亲密接触”的细节描述，完全不顾亲情和人伦常理而走“高大上”和“神化”的极端，从而严重脱离实际。此举不但没能抑制恐慌和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效果，反而引发了网友对其客观性、真实性的质疑，甚至遭受猛烈的批评。

（二）“方案导向”过犹不及

不同于“扒粪”一类的调查性报道追溯“过去发生了什么”，建设性新闻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记者在其中扮演推动者、解困者的角色（史安斌、王沛楠，2019），记者不仅仅报道问题，而且使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徐敬宏等，2019），即使有解决方案，其效用也会因人而异、因时因境而异。不能将是否提出解决方案作为判断建设性新闻好坏的标准，认为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就不是建设性新闻。否则，当面向未来的“方案导向”逾越建设性新闻理念的边界，在“方案导向”上走极端（如图2所示），容易带来以下问题。

一是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着急提出方案。方案能切中要害、对症下药固然很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新闻事件中真相的发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过早地对问题定性、提出解决方案是盲目的，反而会误导受众。特别在自媒体时代，一般是从社交媒体上的个体开始发声，到网络大V转发，然后到新媒体跟进，再到传统媒体追踪调查，真相才会逐渐水落石出。在新闻时效性的压力下，如果记者过早地对问题定性，未经深入调查就用自己的经验提出解决方案，反而容易犯错和误导受众。有学者指出，科学实证与新闻的有机结合存在诸多问题，要在报道中提供可供参考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必须确保解决方案的长期有效性，如果仅仅报道短期的实验结果，会给问题的解决和民众的行动带来一定风险（安·阮、曾昕，2019）。

二是万金油式的解决方案难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对于记者而言，认为提出了解决方案就万事大吉，不经过再三思考就将其传播给受众，实则是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一种误读。当记者把新闻传播给受众时，必须思考解决方案是否足够科学严谨，在何种程度上是通用的，以及适合哪些目标受众阅读。当今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信息的个性化，脱离个人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容易沦为假大空的万金油，甚至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例如“居家上网课，停课不停学”对于网络不畅的偏远山区和经济贫困的家庭就不适用，甚至酿成了河南某学生因没有手机上网课而走向轻生的悲剧。“减少外出，增加鸡鱼肉蛋等蛋白质的摄入，增强机体免疫力”对于物资紧缺的地区来说，可能引发市民的抢购行为，造成物价迅速膨胀乃至社会秩序混乱。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好的新闻报道不是直接告诉受众“千人一面”的解决方案，而是教给受众寻找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的路径，引导受众理性思考，实现真正的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四、结语

建设性新闻的诞生是西方对于消极叙事的一种反思，这种思潮诞生于业界的探索实践，进而波及学界的理论探讨。相较之下，虽然我国新闻的建设性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

诞生的背景不同，但是人们对于追求文明进步、美好生活的愿望是相同的。一方面，建设性新闻理念可以与传统的民生新闻、问政节目、暖新闻、服务新闻等进行有机结合，在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将新闻的建设性拓展到更加宏观的层面，回应重大社会关切，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建设性新闻理念还可以运用到国际新闻报道中，消解国家间的刻板印象，促进交流对话，改变西方的负面报道下中国话语失语的困境（Yanqiu & Matingwina, 2018）。另一方面，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融入到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中，通过沉浸式体验引发积极共鸣、传感器拓展新闻线索、数据整合寻求解决路径，能够有效弥补机器新闻实践的不足（万婧、张志强，2020）。这为应对信息茧房、后真相、假新闻、网络群体极化等新问题开拓了新思路，可以优化以往的新闻强制置顶、人工干预算法等硬性方案，从下游新闻分发转向上游内容生产，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用“源头活水”净化网络信息环境，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介的守望、整合与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 [1] Hermans, L., Drok, N. "Plac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Context." *Journalism Practice* 12.6SI (2018):679-694.
- [2] Bro, P.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ponents,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Journalism* 20.4 (2019):504-519.
- [3] 晏青, 凯伦·麦金泰尔. 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J]. 编辑之友, 2017(8), 第5-8页.
- [4] 金苗. 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0), 第110-119页.
- [5] 唐绪军, 殷乐. 西方媒体“好新闻”的实践、理论及借鉴[J]. 对外传播, 2015(11), 第26-27页.
- [6] 杨建宇. 基于方案的新闻：一种建设性实践[J]. 编辑之友, 2015(7), 第67-70页.
- [7] 蔡雯, 郭浩田. 以反传统的实践追求新闻业的传统价值——试析西方新闻界从“公共新闻”到“建设性新闻”的改革运动[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5), 第124-130页.
- [8] 郭毅. 建设性新闻：概念溯源、学理反思与中西对话[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1), 第72-77页.
- [9] McIntyre, K., and Gyldensted, C.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4.2 (2017):20-34.
- [10] McIntyre, K., and Gyldensted, C. "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2.6SI (2018):662-678.
- [11] 尼科·德罗克, 莉丝贝特·赫尔曼斯, 林晓平. 西方视角下的建设性新闻[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22-32页.
- [12] 吴湘韩. 建设性是党媒必须遵循的新闻理念——中国青年报的探索实践[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81-86页.
- [13] 史安斌, 王沛楠. 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 新闻记者, 2019(9), 第32-39页.
- [14] 蔡雯, 凌昱. “建设性新闻”的主要实践特征及社会影响[J]. 新闻与写作, 2020(2), 第5-12页.
- [15] 张艳秋. 中国对非传播的建构性新闻学术话语建构：内涵与价值[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87-90页.
- [16] 刘九洲, 陈曦. 论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J]. 新闻界, 2007(5), 第67-68页.
- [17] 王英, 陈金华. 有效性·建设性·正确性——新闻媒体如何切实提升舆论监督的质量[J]. 新闻爱好者, 2009(23), 第61页.
- [18] 殷乐. 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33-41页.
- [19] 邹明. 从暖新闻到善传播——凤凰网的建设性新闻实践[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76-80页.
- [20] 陆玉方. 建设性新闻的苏州实践与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15-21页.
- [21] 余宗明. 新京报评论的建设性新闻实践[J]. 青年记者, 2020(9), 第22-23页.
- [22] 漆亚林. 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J]. 编辑之友, 2020(3), 第12-21页.
- [23] 胡百精. 概念与语境：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46-52页.
- [24] 李喜根. 用媒体效果理论审视建设性新闻[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120-128页.

- [25] McIntyre, K.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 *Dissertations & Theses Gradworks*. Retrieved from <https://cdr.lib.unc.edu/concern/dissertations/m3012085>.
- [26] Baden, D., McIntyre, K., and Homberg, F.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ve News on Affective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s." *Journalism Studies* 20.13 (2019):1940-1959.
- [27] Kleemans, M., Dohmen, R., Schindwein, L. F., Tamboer, S. L., de Leeuw, R. N. H., and Buijzen, M. "Children's Cognitive Responses to Constructive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20.4 (2019):568-582.
- [28] Kleemans, M., de Leeuw, R. N. H., Gerritsen, J., and Buijzen, M. "Children's Responses to Negative News: The Effects of Constructive Reporting in Newspaper Stories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5 (2017):781-802.
- [29] Meier, K. "How Does the Audience Respond to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wo Experiments with Multifaceted Results." *Journalism Practice* 12.6SI (2018):764-780.
- [30] 徐敬宏, 郭婧玉, 游鑫洋, 胡世明. 建设性新闻: 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J]. 国际新闻界, 2019(8), 第135-153页.
- [31] 蔡雯. 从当代西方新闻改革运动看职业观念转变——“建设性新闻”“方案新闻”“公共新闻”评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60-70页.
- [32] 漆亚林, 刘静静. 建设性新闻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境[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106-113页.
- [33] 安·阮, 曾昕. 携手科学: 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S1), 第114-119页.
- [34] Yanqiu, Z., Matingwina, S. "Exploring Alternative Journalistic Approaches to Report on China and Africa Relations?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Best Reporting Awards Projects i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10.1 (2018):21-37.
- [35] 万婧, 张志强. 人工智能视角下的建设性新闻实践: 以《纽约时报》为例[J]. 国际传播, 2020(1), 第24-33页.

12 Reflecting o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Concerns

· *XU Jing-hong, ZHANG Ru-kun, ZHANG Shi-wen*

[Abstract] In 2019,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research has gained popularity within China's academia, while some scholars praised it, others doubted it. From a cri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and points out that, as a kind of news idea in pursuit of good, its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skills, and future-oriented solution guidance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the constructiveness of Chinese journalism. When it comes to application, we are supposed be alert to its potential theoretical risks, avoid the extreme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solution-based orientation", and absorb critically while combining it with China's real situation.

[Keywords]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structiveness of journalism; positive psychology; news idea

23 From Solution to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Reporting on the Practice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 *SHAO Peng, XIE Yi-ran*

[Abstrac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sidered as the "self-redemption" of western journalism, tries to report new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positive perspective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and promot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s reporting. This trend, seemingly different from, and yet essentially similar to,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 of providing "positive reports" and "positive energy" in China, brings abundant imaginative space for Chinese press circles to do new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port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on the mobile APP of The Pap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 to discuss the elements of "good new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rrent journalistic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ive journalistic philosophy in China with an aim to discover new concepts and thoughts for the positive report and positive energy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news reporting still has yet to get rid of the inertia of publicity discourse with a dualistic framework of typically positive and negative